

盖青◎著

A Study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Founded and Led b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49

1921—1949:

中国共产党
创建和领导的高等教育

研究

上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 Study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Founded and Led b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49

1921—1949:

中国共产党 创建和领导的高等教育

研究

盖青◎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21—1949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高等教育研究. 上/盖青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406-8368-9

I. ①1… II. ①盖…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史—研究—中国—1921—1949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7395号

责任编辑: 邓祥俊 唐健敏

责任技编: 杨启承

装帧设计: 陈国梁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3.125印张 465 000字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06-8368-9

定价: 42.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87621848

绪 论

1921—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高等教育是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活动始于建党之初，到1949年，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几十万优秀领导、各类骨干人才，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高等教育在现代革命各阶段皆由党的领袖人物亲自创建、直接领导，在思想上代表着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高水平，并折射着不同时期复杂的思想探索、交锋与选择。同时高等教育是全面的高级文化活动，党对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人才的要求皆体现于其高等教育体系中。从高等教育学科出发认识党所创建和领导的高等教育历史，对深刻理解党的有关历史和指导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皆具有重要意义。

1949年以后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有几种主要来源，即晚清官办大学接续洋务运动兴学而举办的高等教育，民国高等教育，教会高等教育，留学教育，以及1921—1949年间由中国共产党所创办的高等教育。这几类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都经过了不同的改造而纳入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就研究来看，学界对晚清以降洋务运动以来的高等教育、民国高等教育、教会高等教育、近现代以来的留学教育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专门著述比较丰富。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高等教育在1980年代开始有若干著作出版，近二十多年来虽有数种著作，比之其他类型高等教育的研究则可谓疏落，与其重要地位和影响实非相称。

虽颇为寂寥，这个领域的研究仍取得了宝贵的成果。在建立理论框架、探讨历史事实方面已打下一定基础，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得出了可信的结论。史料搜集、整理、编纂工作尤为可贵。当然，继续深入研究仍很必要。第一，对何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等教育”等基础概念理论界并无共识。这表明对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性质的认识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论证。第二，迄今并未产生一部贯通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三个时期、把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研究专著。因而历史事实特征、理论因果关系，亦未能得到完整呈现或说明。第三，在已有的许多具体结论上，研究不够深入。一些研究所作结论公式化，有待突破。第四，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展，新的史料进入思考范围，亦将使我们对有关历史的理解变得更深厚和完整。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对我们来说，接续近代以来无数先贤为之努力的事业，在中国已经实现了国家与民族的政治独立、成为经济强国、社会极大进步、对世界产生重要而广泛影响的今天，全面地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特别是文化的复兴，正

1921—1949：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高等教育研究（上）

6

是当代人的历史使命。以发展高等教育来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进步，长期以来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高等教育的走向，过去、今天乃至未来，都全面地并将继续深刻影响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同时，高等教育的每一步发展都基于对过去历史的反思和对新目标的确定。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既不曾原封不动遗传历史，同时又不能不是历史的产物。

我国高等教育的诞生与发展，已有悠久历史。当其诞生之初，人们是为解决当时历史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精神文化的养成，制度的创建，知识的积聚、传布和专门化；实际上知识的专门化很早已开始，《周礼》中360个官职中有相当一批需要专门知识，必须由专门训练的人来担任的。早于周代的高级教育也见于记载。王事、宗教、军事、生产、生活、文化，已设众多专职专人。用高深学问培养人才，实现社会政治的和宗教的目标，制约和引导社会的走向，为解决此类重大问题，而逐渐发展出高深学问，并与初级的学习、生活与生产的一般技艺、行为习惯的养成、常识性知识相区别。后者被列为“小学”，前者大致与现代所说高等教育的性质在“高级的”、“高深的”知识等内涵上一致。历来的人们，在前人所开辟的道路上，传承文化之大体，扩展时代之新义，形成了中国的文教传统。《学记》载：“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近代以前，中国有悠久的大学教育史。古代中国，文化统治是社会运作与维系的重要方式。历来在政治“纲纪”之下，文化编织着政纲撑起的天空，协调社会，实现特定历史中的共同目标。人们于日用人伦中安身立命、趋善求道，从个体来说，基本是文化行为。大学则视为中国文化生存、发展、传布的基本领地，是文化统治中最为“有迹可寻”的实体。因而对大学史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对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统治史的理解。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整个教育被逼出原有轨道，在历史的塑造中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貌。传统高等教育在晚清时期原本发展到一个有史以来所未曾企及的高峰，却血淋淋地被人为斩断。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从西方移植了其知识体系和学校制度。然而近代中国不是文化白地，即使外来文化，也只能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把体、用分别对待，体为本而用为末，这不是张氏个人的态度和想法，而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反应。张之洞的主张基本上代表了晚清官办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至1903年“癸卯学制”仍坚持“以中国经史之学为本”）。民国革命后的“壬子·癸丑学制”与“大学令”（1912—1913），其与革命前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废经学。平心而观，张之洞等人在大学学科设置上，对西学的“物”世界研究与“利用”等学问是不拒绝的，“两湖书院分习经学、史学、地舆学、算学四门，图学附于地舆。……经心书院分习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两书院所习八门，皆系学人必应讲通晓之事”^①，其中经史之外亦多为学习西方

^① 张之洞：《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M]，《张文襄公全集·奏议》。

应用学科。所以“废经学”不是要不要学习西方文化（学西学并无异议），而是要废掉经学所承载的中国学术文化本体。

近三十年来民国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教会高等教育、留学教育则属外来文化，秉各自民族文化背景，负有在中国举办之特殊目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等教育也深受西方教育影响。中华民族是善于学习的民族，她从不同的国家与民族的高等教育中已经吸收了大量宝贵财富。近代以来这几类高等教育在实践上各有做法，在理论上各有不同的目标和理据。对它们作全面而无偏废的研究，皆为认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及特质之所必须。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高等教育的研究，除上述基本方面的意义之外，就其特殊性来说，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国家政权，全面接管和改造了原有各种高等教育；而此前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已经历了近三十年办学历史，其理念、制度、经验、人才等等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尤为深远。另一方面，正如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也有其自身的形成与发展史，具有历史的种种特殊性。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从中国旧有的（即传统的）文化哪些关节点上开始生长，什么是它的土壤，其特性在现代革命中经过何种淬炼而延续或随历史情境而消失，哪些发生了改变，哪些又得以生长，超越了特殊条件而获得一般性质，发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和作用，这些是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而且，对历史的认识往往亦因后人面临时代环境不同而发生变化。新的历史条件为今天重新认识过去提出了新的需要。这是史学常新的生命力之源泉。

从当前的研究状况来看，1921—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高等教育，有以下特点：

对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教育的研究，与对晚清大学、民国高校、留学运动、教会大学的研究相比，选题比例低。

较为宏观的统计材料有陈学飞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49—1999》^①共计八卷，其中有高等教育史研究一卷。文章《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50年述评》^②总结，1949—1976年间（30年）中国教育史研究中无一篇（部）涉及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教育。

第一类：论文统计。

对1978—1998，20年间的出版统计，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共有589篇论文，其研究主题分布状态为：

^① 陈学飞：《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49—1999》，[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② 毛祖桓：《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50年述评》，//陈学飞：《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49—1999》，[M]，第1751～1760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

总篇数：589篇。

研究主题	篇数	占总数的百分比
清末	84	14.3%
民国	140	24%
教会大学	50	8.5%
留学	56	9.5%
中国古代	161	27.3%
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高教	19	3.2%
新中国成立后高教	39	6.6%

第二类：著作统计。

同期著作目录计345部。其中论及中共高等教育的著作计8部，占2.3%。8部著作中回忆、史事记录为主的著作占6部，研究性的著作罕见。

由于著作的部分除综合性著作外多是专史，而专史于一所大学则其本身往往跨越不同时期，通常既属民国又属新中国；综合性多为通史或通论。故此通、专二种皆未便分类。

第三类：微观统计（一个四年为期的统计样本）。

微观统计方面，如李均、王超所著《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史研究的进展》^①，其中1986—1989四年间教育研究论文计17 396篇。其中教育史研究占0.99%，为172篇。统计者列出的专题领域分别是：清末高教研究、洋务高教研究、民国高教研究、教会大学研究、留学教育研究、教育思想史研究，未列有“中共高教研究”一项。统计应根据实际所有的研究来分类，那么事实可能是这样：没有任何一篇研究中共高教的文章，故未设此一项。

第四类：各种专门性著作列入中共高等教育的内容很少或付诸阙如。

在很多关于近现代高等教育综合研究或综合性文集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高等教育历史及人物也较少被提及或讨论，甚至完全不见。如：

1982年钟叔河主编出版的《过去的大学》，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文集。2005年重版。钟叔河在《原序》（1982年版序）中说：

“《过去的学校》的‘过去’，并没有追溯到那么远，大体上是从清末维新变法、初设新式学堂的时候写起。而写这些‘过去的学校’的老先生们，像蔡元培、沈尹默、刘仙洲、茅盾……也多是‘五四’时代的人。他们或者是‘五四’时代的校长、教师，或者是‘五四’时代的学生。也有晚于‘五四’时代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抗战时期的都有。下限则断在1949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新中国成立以

^① 李均、王超：《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史研究的进展》，[J]，《大学教育科学》，2005年第2期。

后,那就只能说是‘现在’,不能叫‘过去’了。”^①

该书编者选文时间范围是从清末至1949年。所录文章作者(大学校长们)39位。所涉及为学校为两类:民国大学和教会大学。

其中未选任何中共大学相关人物或文章。对此编者在说明中有特别交代:“(所选入大学历史)是共产党得天下以前的阶段。除了解放区和地下党主办的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学院)外,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学校还没有成为事实。”^②

周川、黄旭主编的《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选入校长50位,时间范围是“19世纪中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百年中间”^③,未录有中共高校校长。

王忍之主编的大型丛书《百年中国史话》,其中有金以林、丁双平著:《大学史话》^④,其内容为:清末高等教育,民国高等教育,抗战时期内迁大学及沦陷区大学,以及抗战后民国大学情况,未涉及1949年以前中共高等教育。

董孟怀等著《百年教育回眸》^⑤,主要内容:清末大学,教会大学,洋务新学,庚款办学及留学,抗战西迁大学。其中有一节论及抗大。

张人杰、王卫东主编:《20世纪教育学名家名著》^⑥,列入32位教育名家及作品,中共教育家列入第1位。

由此可见,中共高等教育以外其他几类高等教育史的研究,相比更受学界重视。

笔者认为,选题与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当代文化思想潮流的一面镜子。作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来源之一的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在理论界的研究状况,只有在整体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版图中方能体现。这里并非综述,仅仅略览中共高等教育以外其他高等教育史类别近二十年出版情况,以资补充。

第一,清末高等教育与民国高等教育为著作家所重,研究文章与著作最多。既如《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49—1999》所列,这两方面在20年间的研究论文收入此目录者共计38.3%,为各类之首。其研究篇目及书目繁多,不必枚举。

第二,留学教育:留学教育研究领域专著与资料性著作数量比例远高于对1949年

① 钟叔河:《过去的大学·序》,《过去的大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

② 钟叔河:《过去的大学·原序》,《过去的大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

③ 周川、黄旭主编:《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潘懋元序,《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④ 王忍之主编:《百年中国史话》,金以林,丁双平著:《大学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⑤ 董孟怀等著:《百年教育回眸》,[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⑥ 张人杰、王卫东主编:《20世纪教育学名家名著》,[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1921—1949：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高等教育研究（上）

以前中共高等教育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1980—2000年间出版的著作有：

姚公骞、汪叔子、邓光东：《中国百年留学精英传》（1~4卷）^①；

张允侯、殷叙彝、李峻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2卷）^②；

贺培真：《留法勤工俭学日记》^③；

郑名桢编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④；

张洪祥、王永祥编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⑤；

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⑥；

〔日〕森时彦著，史会来、尚信译，何长工、战景武审定：《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小史》^⑦；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图录》^⑧；

留学生丛书编委会：《中国留学史萃》^⑨；

沈殿成主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上、下册）^⑩；

吴霓：《中国人留学史话》^⑪；

丁扬东主编：《中国著名人物留学生涯》^⑫；

陈潮：《近代留学生》^⑬；

李喜所、陈新华、蔡敏：《留学旧踪》^⑭；

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⑮；

① 姚公骞等：《中国百年留学精英传》（第一至四卷），〔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

② 张允侯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③ 贺培真：《留法勤工俭学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 郑名桢：《留法勤工俭学运动》，〔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

⑤ 张洪祥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⑥ 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M〕，成都：巴蜀书社出版，1994年。

⑦ 〔日〕森时彦著，史会来、尚信译，何长工、战景武审定：《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小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⑧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图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⑨ 留学生丛书编委会：《中国留学史萃》，〔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

⑩ 沈殿成主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上、下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⑪ 吴霓：《中国人留学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⑫ 丁扬东主编：《中国著名人物留学生涯》，〔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

⑬ 陈潮：《近代留学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⑭ 李喜所、陈新华、蔡敏：《留学旧踪》，〔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⑮ 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黄利群：《留美勤工俭学简史》^①；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②；
 李喜所：《近代中国留学生》^③；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④；
 陈学恂等：《留学教育：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⑤；
 黄新宪：《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⑥；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⑦；
 丘岭、范闽仙编著：《百年留学潮》^⑧；
 董守义：《跨出国门：清末出国潮》^⑨；
 周棉主编：《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⑩；
 黄利群：《中国近代留美教育史略》^⑪；等等。

第三，教会高等教育：教会高等教育是国内高等教育史学界研究的又一热点。19~20世纪举办于中国的教会大学共计16所（13所基督教大学，3所天主教大学）。现有大型工具资料书籍《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五册（《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综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南京、《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武汉、《华西医科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成都、《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资料》）将主要办学资料极大收集。1980年以后出版各类专著亦堪称丰富，体现了学界对此研究领域的持续兴趣。其中有：

章开沅、马敏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章开沅等：《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美]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编辑组：《风云录》（辅仁大学校友丛书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① 黄利群：《留美勤工俭学简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②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3年。

③ 李喜所：《近代中国留学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④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

⑤ 陈学恂等：《留学教育：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⑥ 黄新宪：《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⑦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⑧ 丘岭、范闽仙编著：《百年留学潮》，[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⑨ 董守义：《跨出国门：清末出国潮》，[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⑩ 周棉主编：《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⑪ 黄利群：《中国近代留美教育史略》，[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

1921—1949：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高等教育研究（上）

12

1985）；

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谭双泉：《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陶飞亚、吴梓明著：《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周晓明著：《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陈远：《逝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05）；等等。

以上出版情况仅为管窥，部分地说明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当前研究视野。

1921—1949年中共高等教育研究的已有著述当然是新研究首先需要面对的。

有关1921—1949年中共高等教育研究的专著仅有一部，即曲士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这部著作是唯一以“高等教育”为主题来研究中国共产党所办此类教育活动的专著。

曲著对“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等教育”给予了简明定义，即“主要是指专科或专科以上的学校（包括学院、公学和大学），这些学校实施高等教育，给学生以较高级的专门教育，培养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人才。”^①

这部著作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解放区的中共高等教育概况，具体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大学等4所高等学校为主。其他一些高等学校作了较简单的介绍。

曲著把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为主的解放区高等教育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大发展阶段”、“大整顿阶段”、“大提高阶段”，这个划分基本体现了作者对抗战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的观点和看法，即：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大办高等教育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整风运动是重要和必要的，是后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条件。经过前面两个阶段之后，解放区高等教育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曲著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作了简要说明。梳理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有关教育政策。

在“第八章 办学的若干经验”中，提出中共高等教育教学原则为：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教育计划、教授法和学习法方面根据实际情况作了归纳。专题讨论了高等学校中“政治工作”主题，构成“办学经验”重要部分。研究资料引征清楚。另一方面，曲著对中共统称高等教育学校为“干部学校”，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关系，未予说明；对于三个阶段的高等教育，以叙述过程为主；全

^① 曲士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前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书归纳了中共高等教育办学经验中几个重要的方面（教学及政治工作等），仅作归纳，未予理论讨论；作者对抗战时期延安解放区高等学校作了若干院校的重点讨论，未及于所有学校。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著作的目的是“仅从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解放区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有关高等院校的概况、办学若干经验等方面作初步评介”，其他问题并不在作者设定之内。

专著以外，在通史，通论，其他专著涉及中共高等教育思想、实践、制度等有关联的著作有一批重要成果。其中有：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科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该书记述范围从新文化运动开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内容及于民国时期各类教育，以及中国共产党各类教育。

“第二章第四节 党领导下的革命干部教育”部分，对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劳动学院、农民运动讲习所作了概况介绍，其评论为：“党领导下的革命干部教育，特别像自修大学、湘江大学、上海大学、劳动学院以及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不仅培养了许多又红又专的革命干部，并且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首次出现的新型人民学校，这些干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实践，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成为贯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典范”^①。此为原则性结论，但未予论证。“第四章第二节”简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②，未展开过程叙述与理论讨论。

“第七章第二节”有“高等教育”专题。这一节辨析了中国共产党各级各类教育的关系：干部教育包括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高等小学；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在文化层次上交叉。这一定义使“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单独成为一个类型，与国民教育相区别；又从文化层级上使之与国民教育相对照和比较，指出“干部教育”的一部分属于“高等教育”。它节列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高等教育“影响大的干部学校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③。集中介绍了抗日军政大学，对抗大的教学方法有较为细致的记述。

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3），第十一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等教育》。熊著把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创办的高等教育与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高等教育放在同一章，总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等教育”，然后分节讨论各时期高等教育。

①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科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史》，[M]，第12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② 同上书，第167~169页。

③ 同上书，第296~297页。

1921—1949：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高等教育研究（上）

这部通史性的著作出版较早，其方法对后来的研究有较大影响。作者没有特别地对“中共高等教育”给以定义，但把中国共产党建党至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统一论述本身就是一种定义方法。在这个叙述方法里包含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在性质、制度、层次等方面前后一致或趋于一致的看法。

在具体分节中作者表达了对“时期”的划分，第一个时期始于建党时期（1921年），至1927年这段历史时期所建学校结束，依次为湖南自修大学、平民女校高等班、上海大学、农民运动讲习所、劳动学院、中法大学。第二个时期为土地革命时期，依次介绍工农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级师范学校。第三个时期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陕北根据地（延安）党的高等教育，述及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之后也介绍了向新中国过渡时期的中共高等学校变化的一些情况。

熊著全书结构所显示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概念、具体分节的时期划分方法以及所圈选院校，表示了作者认为哪些是重要学校。概念虽未明言，但予以了明示。熊著把1921年至其写作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创办及新中国成立后领导的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统为一类，但未解释此类高等教育与其他高等教育的异同。

笔者认为熊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教育”概念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建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等教育，有一定困难。虽然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也在党的领导下，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党所领导的两种高等教育在内涵上存在较大区别。

上述各校的讨论均以介绍为主，基本不涉及理论辨析与总结。在这个意义上，有关的研究仅仅是开端。

教育通史类著作中的重要作品还有曲士培著《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其中有多章节涉及中共高等教育研究，包括：

第八章第二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学教育

第九章第一节：革命根据地的大学教育

第十章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教育（上）1937—1945

第十二章第一节：解放区的大学教育

曲士培这部著作是中国大学教育的通史性著作。上述章节即此著作中述及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的部分。

曲著“第八章 五四运动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大学教育”，主要讨论中国共产党早期高等教育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大学教育。在中共高等教育部分简要介绍了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法大学、劳动学院、平民女学概况。

“第九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大学教育”，包括中共高等教育和国民党统治区大学教育两部分。在中共高等教育部分简要介绍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概况。

“第十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教育（上）”，整篇论述中国共产党解放区高等教育，大致与曲氏专著《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同。

在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时期的划分上，曲著与熊明安对中共高等教育各时期划分方法一致；但曲著不仅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三个时期来划分中共高等教育，——就是说，用党的现代历史过程作党的高等教育历程分期法，而且也用以分期各类高等教育（北洋军阀统治下国内高等教育和国民党统治区高等教育），把各种类别的高等教育以中国共产党历史阶段/过程时间轴来加以体现。

曲著这一对历史时间的理解方式表现了他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内在动力的认知，并以“时间”赋予其外在形式。这一形式的内在逻辑是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史观来统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包含新文化运动对旧的封建主义文化教育的否定，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否定，以及对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肯定。新民主主义教育从属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其重要部分，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集中表现。曲著不仅以新民主主义观点解释中国共产党的高等教育，也用这一观点来判定整个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性质和状态，具体说就是对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高等教育在历史认知中的坐标。对此一历史分期法曲氏未作说明，但贯穿于其著作。与以往处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把这几个部分分立，各以其理论为逻辑依据的“分述”方式相比，曲著不仅具有统一的历史观而免于在对诸不同性质高等教育的分析中包含内在矛盾，尤为突出了统一于新民主主义历史观的教育思想。

由于《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上起夏商周下及1990年代，相对各部分都比较简略。但这部著作不仅在现代教育史方面著者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事实上通过从古至今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曲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中国高等教育观。这部著作首先回答了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迄今学界对我国高等教育起源、内涵等问题的看法仍存在深刻分歧。“高等教育”是一个现代概念，它的“高等”是与“中等”、“初等”相对而存在的；古代没有“中等”，整个体系也不是这个含义。这个意义上“高等教育”是工业化的产物。人们一般承认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与古代大学教育有某种联系，但是何种联系则言人人殊。如果说把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产生溯源至欧美中世纪大学，即“意大利的萨勒诺大学和波伦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蒙比利埃大学，以及英国的牛津大学……”^①，这个意见并非如其表面那么荒谬，它有一个强大的“现代”历史观作后盾。这一历史观在宣告中国“旧教育制度走向衰亡”的同时，把西方高等教育史演绎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高等教育史。其逻辑图式基本如此：“中世纪欧洲大学→近代欧洲高等教育→现代欧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高等教育/（以及同时）殖民地国家高等教育→世界高等教育”。

^① 潘懋元、王伟廉主编：《高等教育学》，[M]，第2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1921—1949：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高等教育研究（上）

16

在这一观念下，中国古代大学与现代对立而且截断，“现代”不认“中国古代”是自己的“古代”，并且，凡不合于上述图式的高等教育也就算不上是高等教育。无论这一高等教育史的叙事是否恰好陈述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文化全球扩张的历史轨迹，还是描述了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直接移植自西方的事实，这个理论都包含着对中华文化与教育传统的巨大否定和对真实历史的遮蔽，不仅所得出的历史结论惊人扭曲，而且无法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特点、今后的发展方向给出合理的说法。

笔者认为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试图对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与逻辑作出完整与合理解释，其研究为现代高等教育史作了可贵探索。

张腾霄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抗日战争时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是一部系统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著作，与本研究所指“中共高等教育”有部分重合。这部著作讨论的“干部教育”，不限于学校教育而及于在职教育；不限于高等教育而及于各个等级的干部教育；未称其“高等教育”而统称“干部教育”。

全书有相当篇幅讨论到抗日军政大学等重要根据地高等院校，但并未称之为“高等教育”。由于此著以“干部教育”统辖各类学校的名与实，故未辨别“高等教育”与“干部教育”的相同或区别。作为断代研究，著作未辨别“干部教育”与前面的源流关系；以及抗日战争之后这一类型的教育所发生的其他演变。

张著的一大特点是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涉及中共干部教育的重大理论问题有多个专章讨论，包括“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关于干部教育的理论”、“《实践论》、《矛盾论》与干部教育”、“整风运动与干部教育”、“干部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等。“干部在职教育”也是全书的重要部分。这些专题性讨论涉及抗日战争时期党的许多重大思想论争及其文化和教育政策，根本上认识干部教育决不能离开这些思想论争与政策指引。体例上与院校具体教育活动分述，多少有分离之感。

在总结抗日战争时期干部教育基本经验时，张著作了如下归纳：

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抗日战争时期干部教育的根本保证。
2. 坚持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是干部教育的主要任务。
3.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抗战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原则。
4. 实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干部教育的必由之路。
5. 强调“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把提高学生政治思想素质放在学校工作的首要位置。
6. 在职干部教育与干部学校教育相结合。
7. 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革命传统，是抗日战争时期各级干部学校的传统。^①

^① 张腾霄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抗日战争时期）》，[M]，第464~47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以上归纳代表编著者对此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基本评价。

董纯才主编，张腾霄、皇甫束玉副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

第一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

第二卷（同上，1991）；

第三卷（同上，1993）。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活动的重要著作。全书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革命根据地教育，时间上起自土地革命时期，截至解放战争时期。地域则论及各解放区。内容上涵盖党所建立和领导的各类教育活动。

著者所总结的全著基本观点为：

1. 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而是为劳动大众服务。
2. 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特点建立的。
3. 群众路线。
4. 革命根据地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①。

——以上诸点概括起来，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观点。

由于这部著作不是专门讨论中共高等教育的著作，以上观点如何体现于中共高等教育还是一个应继续研究的问题。宏观地看，中共高等教育本身是党的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一个层级，因此较为完整的根据地教育史是专门类别的教育研究的基础。

郑登云编著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也是一部高等教育通史著作。其中“第十章 无产阶级的新型大学”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1921—1949），对中共高等教育的分析意见主要有几点：

1. “在办学形式上，无产阶级革命大学从短训班式的高级干部学校发展为革命大学，再发展成为正规的高等学校”^②。郑著解释湖南自修大学、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等皆为“短训班式干部学校”，早期、中期干部学校是革命大学的发端，是“中国近代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的萌芽”；“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革命大学是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的形成和发展”。

2. “老解放区的大学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创立与成长壮大，是无产阶级革命大学主要的特征”。

3. “马列主义列为必修课，把政治思想教育摆在首位”。

^① 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一卷），[M]，第24~25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② 郑登云：《中国高等教育史》（上），[M]，第317~31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921—1949：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高等教育研究（上）

4. “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为现实斗争、为生产斗争服务，这是老解放区革命大学的又一个特点。”

笔者认为以上总结性评论，在概念上，没有明确定义“高级干部学校”、“短训班式干部学校”、“干部教育”、“革命大学”等概念的确指。根据地、解放区、老解放区使用上也比较模糊。何谓“近代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又何谓“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存在基本概念混乱。著作关于中共高等教育所提出的四点归纳，其中第一点，即认为早期和中期是短训班或主要是短训班（干部教育），至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大学为代表）开始发展到“革命大学”。

笔者认为把早期、中期中共高等教育只作“短训班”来评价，有几个问题：

第一，较多着眼于学校制度化形式。但“高等教育”并非仅从学校形式一个角度定义，学校的“正规化”程度，学校文化性质、教育层级、培养目标等都应该判断高等教育是否成立的标准。中国高级人才培养（高等教育）的学校形式，历来并非仅有现代制度化形式如系科专业、肄业年限、文凭制度等一种。另一方面中共高等教育亦因实际学科需要来设置教学年限等常规，如1939年（邓著所说中共高等教育成熟期以前）自然科学院的学习年限为3~4年，这是根据所学习学科需要来设定的。鲁迅艺术学院各专学习年限亦因不同培训而时间长短不一。

第二，中国共产党早期、中期高等教育建立了不同学校，具有类型意义。后期举办的学校并非直线地延续了前期学校的类型，如劳动学院等培养工运干部的学校后来并无后继。其他学校的发展与继承关系也比较复杂。

第三，必须看到中共高等教育从其性质到举办形式，既非王朝传统官办学校，与移入中国的“洋派”大学也不同。需要思考的是它本身的特点。如果认为抗日战争以后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高等教育才进入所谓成熟阶段，其实是不承认中共高等教育主要实践，至少是不认为那些是“高等教育”。这自然成为论著中明显的自我矛盾。

前述为教育专著、教育史著作。教育思想史方面的重要著作有：

高奇：《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其中论及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思想的部分为第二编第四章第六节：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第二编第五章：从1927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第一节：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方针及干部教育。

笔者认为高著有关中共高等教育思想论述中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是从教育思想史的角度论及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源流，上溯李大钊有关工人、平民教育思想，党的二大党纲中有关思想逐渐形成的发展踪迹，经过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许多实践，至1940年代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在毛泽东的表述中达到完整和明确体现，成为抗战建国文化教育思想的纲领。清晰整理这一思想发展的脉络有助于对历史过程的认识，高著从“观念史”的角度得到对中共高等教育思想源流的清晰认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